

西大梁遗址考古发掘研究工作全面启动

本报记者 付裕

日前，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的一处重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遗址——西大梁遗址全面启动考古发掘研究工作。

此次发掘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主导，联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赤峰学院、敖汉博物馆共同发掘。



西大梁遗址平面正射影像图

全面启动考古发掘研究工作

西大梁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为一处重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遗址。

敖汉旗位于内蒙古东南部，南与辽宁省朝阳市毗邻，东与内蒙古通辽市接壤。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考古工作队(注:2003年分为内蒙古第一、第二工作队，其中，内蒙古第一工作队主要在敖汉旗开展史前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内蒙古第二工作队主要在巴林左旗开展辽上京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在敖汉旗开展了连续不间断的考古工作，至今已有半世纪之久，并发现诸多重要考古遗址。

其中，兴隆洼遗址是目前唯一全部揭露出房址、灰坑、窖穴等全部居住性遗迹的史前聚落;在小山遗址的发掘中，曾出土过一件绘有猪、鹿、鸟三纹纹的尊形器，是史前艺术考古极为重要的发现;曾经考古发掘的大甸子遗址，是已揭露的面积最大、等级最高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对了解西辽河流域青铜时代早期的埋葬制度、社会发展阶段及北方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前辈学者陆续提出了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加上此前命名的红山文化、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等，基本建立起了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的完整、连续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在全国主要考古学文化区中占据前列。

进入21世纪以来，在聚落考古理念的指导下，史前考古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对兴隆洼遗址的发掘，为研究本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至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传播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考古材料，也为西辽河流域文明化进程及早期国家形态研究增添了新的视角。

除上述发掘外，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还曾先后对敖汉河、孟克河流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区域系统调查，发现不同时期的遗址百余处，对不同流域不同时期的遗址数量、分布及聚落形态演变等有较深入的认识。连续、不间断、高水平的考古工作，揭露出了厚重的史前文化积淀，也为下一步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日前举行的西大梁遗址考古发掘启动现场调研及座谈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内蒙古第一工作队队

长、西大梁遗址考古队领队刘国祥介绍，即将正式启动考古发掘工作的西大梁遗址，是在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中发现的重要遗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曾对遗址进行过复查。

2019年5月，为系统了解敖汉旗孟克河流域史前至早期青铜时代的遗址分布与聚落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与敖汉博物馆联合对城子山、鸭鸡山周边进行了区域系统调查，其间，再次对西大梁遗址进行了调查，详细记录了遗址面积及采集遗物信息。

2022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对遗址进行复查，重点关注西大梁及周边遗址与城子山、鸭鸡山之间的关系。

据了解，西大梁遗址东、南、北三面为冲沟，西面有保存较好的城墙与环壕。遗址北坡发现至少三处疑似墙体的石块堆积，整体宽度约2至3米。石堆中采集到部分夏家店下层文化陶片。遗址南侧断崖处可见较为明显的房址及文化层堆积。遗址地表可见多处明显的灰圈，灰圈中心及周边分布有较多的陶片及部分石器。

经多次考古调查确认，西大梁遗址为一处性质较为单纯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遗址，保存较好，地层堆积较厚，地表遗迹、遗物分布面积近15万平方米，实际面积应更大，具备长时期、大面积精细发掘的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西大梁遗址地理位置特殊，南望鸭鸡山，北眺城子山，位于两处夏家店下层文化祭祀遗址之间，同附近的四十亩地、鸭鸡庙、西转山子、八十亩地等构成区域聚落群，在城子山——鸭鸡山祭祀遗址群中占据较为特殊的位置。

刘国祥表示，此前孟克河流域揭露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很少，对西大梁遗址进行系统钻探及科学发掘，对该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类型、分期、年代、聚落形态特征与演变、手工业发展水平、祭祀信仰体系、与中原地区夏商文化的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数字化系统助力未来考古公园建设

夏家店下层文化因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夏家店遗址的发现、发掘而命名，是一支广泛分布于辽西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

根据地层学和类型学研究，并结合碳十四测年数据，一般认为该文化的年代上限距今4000年，下限距今3400年左右，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至早商时期。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指出:“距今四千年前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辽西地区社会发展、文明昌盛的时期，已形成了高于部族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

刘国祥表示，西大梁遗址全面发掘前的准备整理期间，已采集到特色太阳纹玉饰、玛瑙玉块等重要遗存，这为通过开展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对采集样品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提升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认识水平，奠定重要基础并提供良好预期。

更重要的是，这也将为做好城子山遗址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提供重要考古资料支持，切实推动当地经济、文化、社会发展。

据了解，赤峰市敖汉旗城子山遗址是迄今发现的中国北方最大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心祭祀遗址，地处燕山北麓与松辽平原的过渡地带，是敖汉旗北部至高点。2001年该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子山遗址位于赤峰市敖汉旗萨巴乡与玛尼罕乡交界处的哈拉沟村东南4公里的东山上。因东山顶部有石砌围墙，故名“城子山”。

城子山遗址群作为中国东北地区青铜时代遗址里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暴露遗迹最清晰、结构最复杂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对于研究夏家店下层文化社会的演进、城市的形成，社会变革，聚落形态等有着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党委书记张国春指出，鉴于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在辽西地区分布众多，通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遗址开展聚落形态与社会关系的深入研究，对于探讨辽西地区早期青铜时代的文



西大梁遗址出土玉饰

化格局、社会发展阶段、文化传承与对外交流关系等具有深远的意义。

此外，西大梁遗址的发掘也是在培育的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夏家店下层文化综合研究”的重要前期工作，对于深入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夏商文明研究工程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张国春表示，要高水平做好田野考古发掘工作，深入推进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等关键问题的学术研究。进一步加强田野考古工作与自然科学技术的紧密结合，增强考古发掘现场科技检测分析、信息提取、实验室考古、出土文物应急保护等方面的能力建设，推动田野考古工作科技分析和出土文物、遗迹科技保护的常规化、常态化。同时，要加强考古资料整理与研究，深化考古成果阐释，及时刊布最新考古成果，推动高质量考古报告的出版;创新开展考古成果的宣传转化工作，探索“考古研学游”新模式、推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考古纪录片，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

特别的是，要切实推进数字化系统建设。加大对考古站(队)的支持，尽快配备数据采集、监测和存储设备。加强信息安全保障，建立健全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提供设备安装、数据库测试和人员培训服务，尽早完成数字化系统建设。同时，张国春表示，要加强考古基地建设，发掘现场安全建设。要加强考古队标准化建设，推动建立标准化文物库房，增设监控系统、安全预警系统、自动灭火系统，全面确保文物安全。

云英。”朱江在《也来谈谈扬州出土的唐代铜镜》一文中说:“真子即真孝子的简称，飞霜当是古琴曲调十二操之一《履霜操》的别称，整个镜纹的内容则是尹伯奇(西周人，以恪守孝道著称)放逐于野的寓意。”也有人将真子飞霜与东晋戴逵鼓琴事扯在一起，日本学者则多称之为“伯牙弹琴镜”。对于真子飞霜镜的真实寓意难以定论，清代诗人谢雪在长诗《真子飞霜镜歌》中发出了“此镜千年圆不缺，真子为谁疑未决”的感叹!

唐代“真子飞霜”镜有菱形和葵花形两种，这种镜的构图不完全相同，有的镜钮一侧竹林抚琴，一侧鸾凤起舞，荷叶钮座，龟钮穿系，钮上田字格内铭“真子飞霜”四字。有的抚琴、鸾凤、荷塘、荷叶等图案皆一样，不同的是钮上没有铭文，作祥云托月，飞鹤翱翔。

武汉博物馆另藏有一面唐“真子飞霜”镜，上有“真子飞霜”铭文，形制及其他图案也大致一样，不同的是外区一周另有铭文:“凤凰双镜南金装，阴阳各为配，日月恒相会，白玉芙蓉匣，翠羽琼瑶带，同心人，心相亲，照心胆胆保千春。”铭文既赞叹了铜镜铸造之精美，又表达了爱情的真挚，以及对青春不老的美好期望。从铭文“凤凰双镜”来看，这种铜镜应该是成对铸造。“番中金石雅堪韵，宝匣初开窥古制。”“真子一去不复返，造像依然镜里藏。”品赏真子飞霜铜镜，吟咏谢雪诗句，不禁令人感怀万千。

武汉博物馆收藏的两面“真子飞霜”镜均采用高浮雕与浅浮雕结合的技法，做工精湛，主题突出，纹饰深浅相宜，布局严谨;人物、鸾凤自然生动，充满动感。镜体厚重，锡含量较高，显得色泽柔和，规整华贵，题材立意美好，美轮美奂，是唐代社会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体现了盛唐时期铸镜工艺的高超水平。

一代名医吴瑞甫故居

本报记者 照宁

在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后炉社区常青路66号，有一座古朴的闽南传统砖石木厝，这是一代名医吴瑞甫的故居。吴瑞甫(1872-1952年)，名锡璋，字瑞甫，祖辈七代均以行医闻名。



吴瑞甫自幼学习勤勉，14岁时奉祖父命学医，博览历代医书，精研思考，常有独特的见解。清光绪二十九年，31岁的吴瑞甫在福建省的乡试中金榜题名。但他放弃候补知县的资格，遵循“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儒家思想，走上从医之路。

在吴瑞甫看来，“仁心”是医家的最基本的要求，他先后在回春庐、退补斋、振德堂等医馆施诊，医术高明，享有盛誉。吴瑞甫的信条是:“病家有痛方求于吾，若自恃急慢，何为医也!”求诊病人多时，即便日已过午，他也细心应对，丝毫不敢疏忽松懈;遇有病家要求出诊，即使夜半三更，他总是有求必应。吴瑞甫的学生回忆，吴瑞甫在张贴的《医例》中申明“家资清淡者不论”医资，遇到贫困人家，不但不收诊费，有时还帮助垫付药钱。

吴瑞甫早年参加同盟会，任同安青年自治会会长，以行医为掩护从事反清活动，秘密策动起义，响应革命军光复同安。吴瑞甫时任中央医馆厦门支馆馆长，同时发起创办厦门国医专门学校，先办业余研究班，后又扩充为全日制本科班，大力培养中医人才。

1938年，吴瑞甫避居鼓浪屿，日军威逼其出任厦门市维持会会长，遭严词拒绝。并于翌年5月取道香港，避居新加坡，在新加坡同安会馆行医，因屡次治愈危症，名震南洋。至今，同安乡亲中仍流传着“单方一味挽沉”和“起死回生救危艇”等有关吴瑞甫医术的神奇传说。

中医古籍典籍往往深奥难懂，吴瑞甫从14岁开始研读医书，至六七十岁时仍孜孜不倦，并凭借深厚的古文功底，结合家传医技及自身的实践对传统医书的观点和收录的处方进行评注。其主要著作有《校正圣济总录》《伤寒纲要》《中西医温病串解》《奇验喉症明辨》《诊断学》等近20种，其中的《校正圣济总录》200余卷，达200余万字之多，多部书籍多次再版，成为公认的近代中医领军人物和医学名家。

《百年巨匠》清华系列开机暨展播启动仪式举行

本报记者 付裕

“春华秋实——《百年巨匠》清华系列开机暨展播启动仪式”日前在清华大学中央主楼举行。

据了解，《百年巨匠》是聚焦20世纪为中华文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大师巨匠的大型系列人物传记纪录片，分为美术、书法、音乐、文学、科技、建筑、教育、体育、非遗等篇章，旨在通过纪实影像引领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深入领略大师风范，汲取思想智慧，厚植家国情怀，从而不断增强精神力量，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百年巨匠》选取拍摄的人物中，有21位大师与清华大学有关。其中，拍摄完成的有吴冠中、曹禺、黄自、梁思成、茅以升、杨廷宝、马识途7位，拍摄中待拍摄的有竺可桢、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华罗庚、侯德榜、陈寅恪、林语堂、季羡林、蒋南翔、马约翰等14位名家。这些大师巨匠不仅熔铸了清华大学的精神底色，更折射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

为传承大师文脉，赓续巨匠精神，《百年巨匠》特别启动清华系列纪录片开机仪式，并将已经拍摄完成的《百年巨匠》纪录片在清华大学融媒体中心平台展播，多角度讲述他们的不凡人生和辉煌成就。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向波涛在致辞中表示，《百年巨匠》是一项特色鲜明、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的重要文化工程，在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好中国形象方面进行了生动实践，取得了重要成绩，为进一步推动文化繁荣、赓续历史文脉提供了丰富资源。系列纪录片不仅全景式地呈现大师巨匠们的非凡风采和卓越气度，也展现了中国百年以来的历史巨变和时代更迭，更阐释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有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向云驹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是由中国文联主管的国家5A级社会公益组织，成立30年以来，累计实施了1000多项文化公益项目，在促进中国文艺事业繁荣与发展的同时，也塑造和打造了一批享誉海内外的文化公益品牌。其中，大型文化项目《百年巨匠》便是成功案例。

鹰首形盖提梁壶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鹰首形盖提梁壶的壶颈、腹通饰瓦纹，纹饰简约质朴。比较特别的是，壶口、盖均思为鹰首，以下喉为流，上喉为盖，是战国时期青铜壶中罕见的佳器。

青铜壶是较为常见的青铜器品种，有椭圆腹、圆腹、扁方腹、方腹、扁腹等类型，此时铸造的青铜壶多注重装饰纹样，这件鹰首形盖提梁壶是战国时期铜壶的流行范式。



战国时期
高56.5厘米，口径12.2厘米，底径15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两面“真子飞霜”镜的故事

李笙清

盛唐时期，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加上中外文化艺术的交流、碰撞与融合，文化艺术发展迅速，铜镜工艺亦得到极大发展，无论是样式、题材、风格，还是铸镜技术，都趋向于成熟。

在传统的圆形、方形镜外，产生了菱形镜、葵形镜等新的形制，种类上更是推陈出新，瑞兽葡萄镜、瑞兽鸾鸟镜、花鸟镜、对鸟镜、人物故事镜、盘龙镜等丰富多彩，其中人物故事镜题材十分广泛，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历史逸闻及社会生活等许多内容，“真子飞霜”镜即是唐代社会流行的人物故事镜类之一。

唐“真子飞霜”镜，直径23.5厘米，厚0.5厘米，武汉市洪山区石牌岭出土，收藏于武汉博物馆。镜为青铜质地，

素缘。形制为八出葵花形，龟形钮，荷叶形钮座。此镜背上纹饰清晰，构图饱满，主题鲜明，景物围绕钮座分为上下左右四个部分，繁缛而不杂乱。镜下方为荷塘假山，水波清冽，涟漪荡漾，一枝荷叶从水中蜿蜒而起，硕大的荷叶巧妙地成为钮座的装饰，一只乌龟头上尾下，中有穿孔，为镜钮。镜上方方形田字格内有阳文楷书“真子飞霜”四字，自右至左分两行排列，字迹端正道劲，富于立体感。钮文之上绘云山日出图，线条细腻，云雾袅绕。镜右侧是几竿翠竹形成稀疏竹林，一高士坐于竹林之前，高士戴冠博带，器宇轩昂，双手放于琴上，正心无旁骛地专习抚琴，仿佛已沉浸于音律带来的忘我之境。看到高士抚琴的专注神情，不禁令人联想

到唐代诗人戴叔伦描写官员脱去朝服、追求宁静生活的诗句:“解佩临清池，抚琴看修竹。”竹林之前，荷塘之畔，设有香案。古人鼓琴，必衣冠整肃，净手焚香，极其虔诚。铜镜左侧，两株梧桐之下，一只鸾凤正配合琴声舒展双翅翩翩起舞，长尾高踞，婀娜多姿，轻盈曼妙，动感十足，颇有几分南北朝诗人范泰笔下鸾鸟“轩翼颺轻风，清响中天厉”的意境之美。

“真子飞霜”是唐镜中多见的题材之一，对纹饰内容的解读莫衷一是，至今仍无定论。有人根据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面“真子飞霜”方镜上的铭文“侯谨之”，认为是取材于东汉文学家侯瑾隐居山林以抚琴为乐的故事。侯谨(约公元190年前后在世)，字子瑜，敦煌人，少时家贫，但勤奋好学，白天给别人当佣人，夜里点燃柴火读书。官府闻其名，屡次征召，都被他以病推辞。后隐居山中，专心学问，精心著述，著有《桥世论》《应难》《皇德论》等，被河西人称为“侯君”。相传侯谨善抚琴，后被不断神话，变成道家仙人。有人认为真子是鼓琴之人，飞霜是弹奏的歌曲名。清代钱坫在《浣溪花拜石镜铭集》中说:“真子者鼓琴之人，飞霜当是操名，但遍检书传及琴谱诸书皆不可得。”清代冯云鹏、冯云鹤在《金石索》中说:“真子未详，或取修真炼道之意，如南真夫人及元真子之类。飞霜疑即元霜，裴翥遇元霜夫人，与诗云元霜捣尽见



唐“真子飞霜”镜